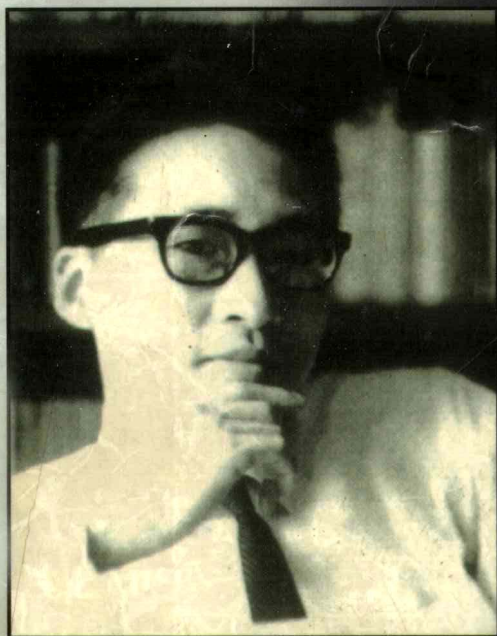


李敖文集

狂放不羈，才华横溢，使台湾朝野为之震惊的——李敖
纵笔所至，所向披靡，在台湾文坛呼风唤雨的——李敖



台 湾 文 坛 第 一 狂 人

李敖精品文集

胡 枫 编著

下册

云南人民出版社

黑夜的思索

蒋介石向大流氓磕头拜寿

上海大流氓黄金荣，是浙江余姚人，十二岁到上海，二十四岁混到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虽然是“刑警”，可是兼营走私、绑票等勾当，也是流氓。他在巡捕房一路福星，由包探升为探目，再升为督察员，再升为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一九二五年退休，仍被聘为警备处顾问，法国帝国主义三次授勋给这头走狗，可见此人的显赫。

据乡波《黄金荣事略》，黄金荣指挥上海码头上“三十六股党”、租界里“八股党”、和手下“一百零八将”，为“租界当局效劳”。同时也在这茶楼里布置走私、绑票等勾当，为自己聚敛钱财。上海法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帮会势力就此熔为一炉，官警和流氓也就此铸成一体。”在一体的局面下：

黄金荣凭借他的地位和权势，在租界当局的默许下，指挥他的徒众给上海烟土商押运鸦片，从中获得巨利。后来和杜月笙、张啸林等合股办走“三鑫公司”，在法租界捕房的武装警卫下，包办了法租界的烟土经销，连何丰林和军警头目俞叶封也相继入股。在军阀、租界当局和军警一体保护下，三鑫公司的营业日趋兴旺，为黄金荣聚集了大量财富。

他聚财的另一途径是开赌局。早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他就和门下人开设了新吉利赌台，后来发展到合股开设五、六个大赌台，除每月从各赌台分得盈利外，每个赌台每天还要孝敬他一百元。另外，黄家数以百计的仆佣不用黄金荣支薪，一律到赌台去拿俸禄。与此同时，他又先后开设日新浴室、大观园浴室、荣记大舞台

黄金大戏院、共舞台等。……

一个两手空空的流氓靠烟、赌、敲诈等办法，不仅拥有了上述种种产业，而且在上海的源成里、钧培里拥有数十幢里弄房产。在苏州唯亭乡下数百亩良田，成了家产巨万的大富翁。

黄金荣的门人遍及上海各个角落，各个行业，上自军阀政客、律师报人、工商巨贾，下至侍役车夫、地痞流氓，入黄门者数以千计。

在“数以千计”的黄门狐群狗党里，其中有一个小流氓，就是蒋介石。

据黄金荣的心腹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第十节《黄金荣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看出小流氓蒋介石的发迹，与大流氓黄金荣息息相关：

蒋介石当初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划线”的小职员，收入不多，很不得意。耳闻黄金荣的势力，就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先生。黄金荣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投了门生帖子。

一九二一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不景气风潮，蒋介石和陈果夫等经营的恒泰号经纪行亏空甚巨，蒋本人亦负债数千元。经黄金荣、虞洽卿出面代为了结。当时蒋想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黄金荣认为自己替孙先生出过力，就与虞洽卿一同资助旅费，使蒋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九年提至一九二七年期，蒋介石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在到上海

之前，黄金荣即和虞洽卿商量，退还门生贴子。蒋介石到上海后，由虞洽卿同去黄金荣家探望，黄改变了过去的师徒称呼，对蒋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贴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蒋介石当时谦虚地说：“先生就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说罢从怀中取出一只黄澄澄的金挂表送到黄金荣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黄金荣接过去，连连称谢。黄金荣对这只金表，一向重视，每逢喜庆大事，总要拿来炫耀一番，一直保存到死后，被黄源煮取去。

北伐军到上海后，黄金荣和虞洽卿等，曾召集工商界以及社会名流为蒋接风祝贺，并为蒋的军队筹集了拾万元的“慰劳费”，蒋把十万元交给虞洽卿、黄金荣，虞洽卿把五万元捐献给慈善事业，黄金荣也捐给陆伯鸿等办教会事业。

蒋介石北伐到上海时，警卫部队约一百多人，驻扎在南市董家渡附近，蒋本人决定随带警卫队长便衣进入法租界，为了保护蒋介石的安全，警卫队抽调了六十多人，开了两辆军用卡车，由董家渡出发，经外马路转一枝春街，准备进入法租界的爱多亚路。车到一枝春街口，被法租界的安南巡捕拦阻，不许这批军警进入租界，并将两辆警卫车拦进法租界巡捕房，警卫班长也被扣押。黄金荣得知后，亲自到法租界巡捕房，与程子卿一起向法捕房头头解释，说蒋总司令进入租界是看黄的，黄为安全起见，请蒋的警卫队开进租界到黄家保卫，希望和平解决。法捕房打电话请示法国领事馆，法领事感到事态严重，指示捕房让黄金荣出面调解，黄金荣主张先让被扣押的两辆警卫车开进法租界游行一圈，然后开到八仙桥钩培里黄家。法捕房同意了黄的主张。通知一枝春街的法捕房让警卫开进法租界，经爱多亚路进入八仙桥钩培里路口。黄金荣办了这件事，颇得蒋介石的赞赏。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反共急先锋，蒋介石先后拨付十多万元费用，并在事后由陆军总司令部名义，聘任黄金荣为少将参议，杜月笙、张啸林为少将顾问，后来又委黄金荣为南京国民政府参议，奖给勋章。黄家花园落成时，蒋介石题了“文行忠信”的四字，黄金荣奉如至宝，刻在黄家花园四教厅（四教厅的命名就是根据蒋介石题的四个字）右边的六角亭上，在黄氏门人结社时，也以“忠信”为社名。

正因为黄金荣、蒋介石这对流氓师徒间的关系，非比寻常，所以一九四九年黄金荣八十大寿时，蒋介石虽以一国总统之尊，却要秘密行帮中规矩：

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黄金荣的八十寿辰，按照往例，每年黄金荣生日，他的徒弟徒孙不下三千余人，都要孝敬送礼，最少的百把元，多的上千元。在做六十寿辰时，他把漕河泾的黄家祠堂扩建为黄家花园，就是靠徒弟徒孙孝敬以及工商界的送礼，自己没花一文，还捞进了几万元。现在八十做寿，应该又是一个良机，但是黄金荣考虑到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对我和鲁锦臣等说：“今年不要太铺张。因时局不利，还是节省点好，就在玉佛寺摆素菜席算了。”当时我和鲁锦臣、杭石君、龚天健等商量后，请杨虎、杜月笙主持，黄振世为总务，鲁锦臣和我接待宾客。那天前来拜寿的有蒋纬国、上海市长吴国桢、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各局局长，由杨虎、杜月笙接待，后来孔祥熙也到了，由杜月笙接待。将近十一时，李济琛来了，吃了一碗素斋面后，由我陪同去向黄金荣拜寿，李称黄为老大哥，黄金荣听不大懂李济琛的话，后来杨虎把李济琛的话详细讲给黄金荣听，大意是说：蒋介石忘恩负义，打下了天下，就背

叛孙中山，如今又派人捉我，太没有义气，对这样的人，我就是不买帐。现在蒋介石对啸天（杨虎）也当眼中钉了。老大哥，今天我来给你拜寿，也是向你告别，我要到香港去。以后李和杨虎同黄金荣密谈，我不在场，情况不明。据我了解，过去杨虎、李济琛同黄金荣私下做军火生意，曾托黄金荣向法捕房总巡买过军火，是由黄金荣的门徒程子卿接洽的。李济琛离开玉佛寺之前，黄金荣邀他一起照留念，黄、李两人各拍了一张，黄金荣、王晓籁、李济琛和我四个有也拍了一张。

在黄金荣做寿后三天，即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四那天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话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黄金荣得知后喜出望外，吩咐我和锦臣赶快到黄家花园去布置四教厅，黄金荣的徒弟陶雪生听到这个消息，自告奋勇，调到漕河泾的地方自卫团担任花园外面的警卫，花园里面派心腹人员站岗，黄金荣听了很高兴，点头答好，并嘱咐在外面的人可以多一些，花园里站岗的要仔细挑选可靠的，不可大意。

第二天一清早，陶雪生派自卫团五、六百人，在漕河泾前前后后，沿路站岗。把占地近六十亩的黄家花园里，打扫得十分整洁，四教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厅内正中供着福禄寿三星，左右摆着十二把红木大椅（这些红木家具是黄金荣托人从北京特地运来的原根红木精制的）。下午蒋介石来到黄家花园，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杨虎、杭石君、龚天健、鲁锦臣和我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介石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随即亲自动手去搬一只红木大椅，陈希曾马上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红木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黄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磕头时，黄金荣急得站了起来去搀扶蒋介石，蒋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黄金荣准备好的宴席，一口没吃，连茶也没有喝。后来，黄金荣不住夸赞说：“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蒋介石是奸雄人物。他的面目，是非常复杂的，他在黄埔学生面前，是校长；在浙江同乡面前，是乡长；在国大代表面前，是总统；在钱穆、曾约农等老古板面前，是皇帝；在帮会特务面前，是大龙头。……他对黄金荣的磕头拜寿，显然在某种程度的尊重这一流氓体制以维系他在黑社会的面目，而利统治。他这个头，显然磕得值回票价啊！

不可思议的是：设想美国总统若秘密向黑手党头子磕头；或日本天皇秘密向黑龙会头子磕头，这将是一幅什么画面？世界上，只有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才有这种怪现象吧？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八日晨

国民党怎样杀人老婆？

——伏虎·伏虎·伏虎功

后来做过国民党政府主席的林森，在一九一五年，从美国三藩市中国国民党美洲支部，写了一封信给同志曹汤三，信里主张在正义立场上与人争，但在“所见不同”的时候，“可不必要争此闲气”。“伏虎有术，手法亦有异同，吾道必行，不从者多见其不知量耳。”这一伏虎功，可算是国民党式的伏虎功。

共产党也有它的伏虎功。不过却出之以诗词表达，那就是毛泽东一九七五年一首作品《蝶恋花》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风，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急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词是毛泽东怀轼他3的太太杨开慧和其他殉难同志的。大意说因为太太杨开慧被国民党捕去枪毙，她死后，上了九重天了、上了月亮了。月亮上吴刚伐桂，以桂花酒招待他们。寂寞的嫦娥在万里长空之中，也为他们这些为理想而死的忠魂跳舞。忽然间，消息传来，地球上老虎给伏了。（蒋介石打败了），他们自己虽然牺牲了，但是听到这个好消息，也忍不住泪洒长空了。

词中所指其他殉难同志是柳直荀（荀）。据逋叟《李淑一其人》（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中央日报》）所说：

“君失柳”的柳，是指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荀），当民十六“马日事变”（大约是五月二十一日？）以前，柳直荀是湖南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农民协会有校标队，任意捕杀人，长沙藏书家叶德辉的被杀，据说是柳直荀下的手令；马日事变后，柳是到汉口“请愿”的代表之一，随即宣告失踪，在李家，也都是“守口如瓶”的不再提起柳直荀这个人；好像？李淑一曾经给“四总部”传讯过；似乎？并曾羁押过一些时日，但为时并不太久；由乃父李肖聃出面具结领回“看管”。自此，李淑一便带着一个年约三、四岁（？）的女儿和一个更小的男孩子，住在长沙顺星桥的李家。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有一个日本太太，柳直荀和父亲合不来。因之，李淑一嫁为柳家妇后，从未和翁姑在一起过，柳直荀的生母，似乎早已去世？关于柳直荀的消息，传闻不一：有说他和易礼容辈潜伏在上海，有说他随同毛匪上了井冈山，民十九的七、八月间（？）共匪攻破长沙时，事后，传说柳直荀是和李立三在一起？事后，听说柳到了江西的瑞金；又听说柳已经在“富田事变”里给整肃死去？但也有说不是整掉而是在窜逃途中遭病死的。总之，柳直荀是已不在人世了；不过，李淑一为着怕官家追究，却不敢于为其夫“发丧”，当然，更不敢报孝；寂寞岁月，凄凉身世，时李淑一只不过三十未届的少妇呀！

事实上，柳直荀（荀）是一九三三年殉难的。他的太太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好朋友。她在柳直荀死后二十四年了，写了一道诗纪念丈夫，并把这诗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感而有诗，就是上面这首《蝶恋花》。

词中“我失骄杨”的杨开慧，毛泽东的老同学萧瑜在《毛泽东与我讨饭吃》第十一章里，曾有这样的描写：

杨怀中老师有两个小孩子，一男一女，儿子叫开智，女儿叫开慧。开慧的身材很矮小，圆圆的面，长得很像他父亲一样又深又小，但他的皮肤非常白，一

九一二年我第一次看到她时，她是十七岁，正在长沙中学读书。

从那年起，我与另外二个同学，熊光祖和陈昌，每个星期天的早上都到杨老师家去讨论功课，直到吃过了午饭才回学校，吃饭的时候，杨师母与开慧常常来跟我们一道吃，每次她们进来的时候，我们仅是礼貌地向她人鞠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就这样，每个星期天，中午去他家，去了两年，在这两年中，我们每次吃饭都是保持安静，尽快吃饭，没有一个敢说一句话，静得就好像没人似的。我与同学只有在扶同盘菜时，才看到对方的脸，一切事情只有用眼睛及眉毛示意。一九一八年我们到了北平杨老师家时，我们吃饭的规矩还是一样。……

当我一九一九年在巴黎时，意外地接到开慧写给我的一封长信，在信中，她详述她父亲逝世的情形，她知道我非常尊敬她的父亲，她想我对杨老师的死一定会像失去了自己父亲一样的悲伤。她的信写得很感动、很真挚，信末说她要回长沙去了。但她没有给我回信地址，所以，我一直没去回她的信，我与她，从未谈过话，这封是她写给我的仅有的一封。

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回到长沙以后娶开慧为妻。她们有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曾留学莫斯科，非共的中国人叫他“毛王子”。但开慧不是毛的第一个恋人。在我们学校同学中有位陶斯咏小姐，陶小姐也是杨怀中老师的得意门生之一，非常优秀。一九二〇年她与毛泽东在长沙开“文化书局”，最后因意见不合而分手，后来陶小姐跑到上海去办了个学校，叫“立达书院”，在那所学校中，她度过她的余年。她比毛泽东的太太杨开慧年纪大很多。

一九二〇年，我从巴黎取道北平回到长沙后，我向毛打听杨师母及开慧的消息，因为我想去拜访她们，但他只告诉她们住在很远的乡间，关于他与开慧的恋情，一点也不透露，最后，我只有请杨师母的朋友黄太太带一点东西给杨师母。当时没有回开慧的信，我感到很抱歉，没有把他父亲的原稿加以保管，也很令我内疚。

一九二七年，我在南京听说湖南省政府要逮捕杨开慧，因她是共产党毛泽东之妻，我曾为她奔走，写信，打电报至有关方面，请求开恩，但这些努力都徒劳无功。

一九三六年，我第三次到巴黎时，我的老朋友熊光祖跑来看我，我们见了面以后，很伤感地谈到我们的学校，杨老师的家庭，以及开慧被枪毙等事。为开慧的悲惨下场，熊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是润之害死开慧的”。（润之毛泽东的别号）

萧瑜在这一章最后，用诗收尾，谴责毛泽东“太息无情贪霸业，害妻饮恨在黄泉。”这种笔法，是很奇特的。因为要谴责，使杨开慧“饮恨在黄泉”的刽子手国民党也不能不作对象来一下罢？可是萧瑜却只字不提枪毙杨开慧的国民党，这公道吗？

枪毙杨开慧国民党是同省政府主席何健，湖南醴陵人。是国民党中最有名的顽固分子，此公顽固的程度，光在反对小学教科书“鸭小姐”“狗先生”一事上，便可使人领教。录年小学教科书模仿外国童话，采用鸟兽对话方式编书。何健出面反对，说这样会影响儿童的身心。国民党国民政府遂下令重编小学课本。

据李静之写的《何健》，说何健做湖南省主席：

将全省划为二十二个团防区，各区指挥一个，大都以县长兼任，并以“清乡”反共的成绩作为考核县长的主要标准。说：“当县长就要不怕杀人，婆婆妈妈当什么县长！任用县长就要看这一条。”他在全省严密保甲组织。办理“十家联结”，以清乡队、挨户团，烧杀淫掠，无恶不作。靠近苏区的地方更是血洗火烧，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

何健统治湖南期间，竭力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提倡尊孔读经。他经常到机关、学校、部队、演说，侈谈“八德”、五经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学生必须研究孔子经义……正其思想”，规定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读经。

何健统治湖南期间，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他开办银行，滥发纸币，操纵金融；用各种名义发行公债；苛征田赋，恢复厘金，加征盐税；和贵州军队勾结贩运鸦片，将湖南所产砂盗卖给日本。用搜刮的民脂民膏，在长沙、汉口、庐山、上海、香港等地购买大量房地产。

何健枪毙杨开慧，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杨开慧死后十九年，蒋介石和手下何健都被赶出大陆。一九五〇年何健逃到台湾，蒋介石给他干国策顾问。干到一九五六年七十一生日前夕死去，他的著作有《救国的道德》等小册子。好一个“救国的道德”！他们大谈道德、大谈固有文化，其实竟连个“罪人不孥”这一起码标准，都做不到，以至要枪杀无辜妇女，这样子的国民党，真是太要不得了！

孟绝子写《国民党怎样失掉是大陆》（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十日《万岁评论》第二十三期），谈到国民党当年以“清党”办法赶走共产党：

清党的结果也产生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共产党开始建立军队，武装自己，这个副产品演变发展，到了一九四九年冬，把原来享受清党胜利成果的国民党完全打败，使之完全退出大陆。

如果不清党，国民党就不能用军队、特务、黑社会分子杀共产党分子。这样，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唯一的相处方式就是英国式和美国式的两党竞争，方法是通过人民的投票选举。

如果真的这样，也许共产党永远不会得势，也许即便得势，也不会提早到一九四九年。……

既然“清党”不可避免，清党的方法能不能避免“杀”？如果清党的方法做得有点弹性。会不会不发生一九四九国民党退出大陆这一事呢？

弹性的手法就是“不杀”，就是把所有原来被杀的分子全部抓起来，集中在一个城市里或一个地区中，让他们过一般人正常的生活。这样，可以把他们当作人质，也就是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留着一点“香火情”。

例如杨开慧，如果数万计人质中再有一个杨开慧，那些在逃的共产党分子，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多数都会被人质“牵肠挂肚”起来，以后的做法也许就不会太走极端，不会建立军队了。那么，国民党也许就不会在一九四九退出大陆舞台了。

不幸的是，这个“如果”也难在存在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当权派的自信心已经强得超凡入圣，强到“想怎样就怎样”的地步。

所以，国民党以消灭方式清党时做梦也没想到二十二年后居然会被“清掉的党”打出大陆；同样的，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号攻下红都延安，国民党做梦也

没有想到两年后的四月二十四号，共产党军队居然就进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城。

“清党”的是非固然很难说。“清党”的后果让人不禁又想到那句俗语：千算万算，不如天算。

就史论观点上看，孟绝子的话未免太简单了一点；但就是因果论观点上看，国民党的愚蠢和残忍，的确是它失掉大陆的重大原因。国民党伏虎无术，以至自己最后变成为人所伏之虎，夹尾逃到台湾。“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介盆雨”，——理想主义者的血和泪，毕竟没有白流啊！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夜二时

蒋介石与张学良

——大时代的故事，大时代的造谣

我在《从陶百川绑票大学生说起》（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三册《战斗·禁书·K》）里，替历史还公道，替张学良喊冤，我说：今天国民党宣传家宣传他们抗日的历史，是很英武的、决绝的、始终一贯的。但是，这种宣传，在我这种又细心又内行的眼里，显然通不过去。例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一口咬定对日本不抵抗政策责任在张学良，但这绝非张学良一人的责任。为了证实我这种话，我特别引证了国民御用史家敬镛的一段泄底的文字。梁敬镛在《九一八事变史述》里，有这样不自觉的透露：

综观各种措施，除声诉国联，属于积极动作外，其他多含有消极性。盖即不妥协，不作战，亦不直接交涉，自不能为当时学生民众舆论所满意。大公报社评，对于不抵抗政策，指摘尤烈，其辞曰：

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前，已知事态严重，他总以为日本不敢打，……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蒋主席；济南之役，蒋以不抵抗，制福田于无形，一面吁请国联，且不得国联之承认！今之办法，与济南无殊。国府文告中，对日“避免冲突”之指示，即是国府对张学良不抵抗主义之承认。蒋本人“逆来顺受”之演讲，亦是蒋承认不抵抗主义之证据。

吾人今日自日本外省情报档案中，检得民国廿年七月，万宝山事件发生时，蒋、张之间，确曾交换过对日避免冲突之意见。蒋在七月十二日，于右任在七月十三日，均曾密戒张学良，勿生事端，蒋电文中，有“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之辞句，于院长电文中，有“中央现在以平灾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之论调。……

由此可见，把不抵抗主义，一股脑儿记在东北人张学良的账上，是不公道的。

我的文章表后十八天，《中国时报》（一九八二年、九、十八）登出对梁敬镛的专访——《中国人永远忘不了九一八》，引录梁敬镛的看法说：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采不抵抗政策,时人及后世治史者每以此深责于张学良,对此梁氏则认为政策当时的所以决定采取不抵抗,非不为乃是不能也,因此自不应全部怪罪于张学良。但是,话又说回来,眼见国土被侵而仍坚持不抵抗,平情而论终是说不过去的。

梁敬徽这种话里,有一个问题还没有澄清,就是:既然“不应全部怪罪于张学良”,那么由张学良独背黑锅,又是怎么回事?其中必然有有意陷害的成分、必然有张学良为顾全大局“打掉牙,和血吞”的成分,这个真相,在张学良失掉是自由近半个世纪后,已经无法再掩饰了。

是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

最早引起我发掘这个真相兴趣的,是我的三姐夫石锦。石锦和我一样,也是学历史的。石锦的爸爸是石九龄。石九龄,辽宁省锦州市人,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一九二五年参加国民党,在“孙、段、张(孙文、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的空气里,出任司法总长杨庶堪的秘书,而杨庶堪在段仙阁任职,却又和孙文有关。一九二六年,石九龄回到东北办党,曾任军法官、军法处长等职务,以排斥国民党的秘密发展。一九二八年张作霖被炸死,他的儿子张学良和国民党合作,石九龄遂在一九二九年公开出任吉林省党部常务委员。一九二一年九一八事迹,一九三二年国民党将辽宁、吉林、黑龙江、哈尔滨四省市党部事组为东北力事处,石九龄仍出任常务委员。直到一九三九年,前后十年,分别在秘密、公开与地下阶段领导东北党务,所知内情独多。据九龄向石锦无意中透露,所谓张学良不抵抗,事实是国民党中央给张学良命令不抵抗。无异是叫张学良替国民党党中央背黑锅。

当十多年前,石锦告诉我这件内幕以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请你老子写出来?”石锦摇摇头,说他爸爸不敢写,写了也没处发表。

石九龄现在是终身职立法委员,并且还很活跃,这次强制表决通过蹂躏人权的刑事诉讼法,他就是老不死委员中的一名共犯。以这样一个国民党的应声虫和可怜虫。叫他主持正义,替历史还公道、替张学良喊冤,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是“中央”的“主意”

正因为真相被这样掩饰着,所以张学良不抵抗的内情,就连当时在第一线的负责人都不清楚。以九一八事变时六二〇团长王铁汉为例,王铁汉在去年九月十八日,在《中国时报》上写《“九一八”事变经过及其起因后果——“九一八”五十周年感言》,还有这样的话:

我愿把“不抵抗”之由来,作一说明。九一八之夜,我两次接奉电话命令:“不抵抗……”,“不准抵抗……”。这不是事后备受舆论攻击的“不抵抗主义”了。当时王旅长,荣厅长何以下令不抵抗?而后知道,“不抵抗”是出自“不与反抗”的鱼电,那是廿年九月六日,张司令长官从北平发给沈阳荣厅长的电报。

原电要旨：“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这就是“不抵抗”之由来，也是“不抵抗”的依据。可是，不与反抗，系以“寻事”为条件，如果电信不被日本切断，张司令长官所得为日军“全面攻占”的情况，究竟是否仍遵照“鱼”电“不与反抗”，应有问题。

迄今，我总认为“不抵抗”并不是“主义”，更不是中央的“主意”，而是由于电信不灵，情况不明所促成的，再则为当时在沈阳军政负责人员，昧于情势，事前未能提高警觉，来防备敌人的侵袭，临事又未能适应情况，作权宜积极的措施。既系敌人“攻占”，而非“寻事”的情况，就不应作消极的“不与反抗”之处置，仓惶中，以“不抵抗”来应付问题，实为一大错误。这是一个接受“不抵抗”命令的人，而又抵抗的人，对“不抵抗”之感受及不“不抵抗”的由来，作的见证。

王铁汉后来做到辽宁省主席，现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证议委员。他在五十年前做团长的时候，容或不知道不抵抗的真相，但是九一八事变后五十年间，王铁汉历任师长、军长、警备司令、防区司令、省主席、国策顾问、国民党评议委员，五十多年的身居高位，如今却还写出不抵抗“更不是中央的主意”的话，他自然也是应声虫和可怜虫了！

究竟谁在温柔乡？

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虽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但人不在东北，而是“驻在东北主持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张学良为国民党党中央背黑锅，成了全国爱国者嘲笑与责骂的活靶。嘲笑与责骂中最伤他的，是国民党马君武的两首《哀沈阳》的诗，原文是：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两首诗虽然在骂张学良在扯名女人，以致丢掉沈阳的事。诗虽然为全国传诵，但是内容却是造谣，以诗中“蝴蝶”（胡蝶）为例，蝴蝶一生不认识张学良，又哪来翩翩共舞的事？蝴蝶在一九六四年台湾，公然声明这一点。可见张学良被国民党造谣诽谤、已是定论。

可是，我们看看国民党党营的正中书局怎么说。正中书局印彭国栋《艺文掌故续谈》，却继续胡扯，说：

胡蝶在沈阳事变后，丰名噪一时，影入银幕，不啻月殿嫦娥也。中岁演《锁

麟囊》，七彩缤纷，犹有玉环体态。无怪当年张公子时相见也。

可见国民党用心之险恶，至今至已！

所谓“翩翩胡蝶最当行”的事，是日本一家通讯社，是日本一家通讯社“为了打击东北军领袖张学良的声誉”，而造的谣。马君武不察，所以舞文弄墨害人。马君武自己讨小老婆、捧戏子、搞男色，最后倒真是死在“温柔能是英雄家”里，按照他自己的诗来，倒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

黑社会要杀张学良

张学良成为全国爱国者嘲笑与责骂的活靶后，所蒙受的，还不止口诛笔伐，还有被爱国者动作的威胁。一九七二年十月，余子（朱惠清）在《张学良也我的一段因缘》里回忆：

某次，与杜月笙等闲谈中，有人说到张汉卿。余道：“汉卿在雪窦寺时，数次提到杜先生，说是：‘很够朋友！很够义气！’颇表怀念。”杜欣然问道：“伊阿有讲起上次出国时的故事？”余道：“他自家当不便多谈，杜先生可讲给我们听。”杜即眉飞色舞地说道：“伊在北方未动身前，就接到许多匿名信、恐吓信，还有宣布罪状的文书一大堆，我是从上海寄发的。伊派人先拿到上海来，送把我看，阿拉仔细研究了一阵，想到，一定是张子廉的阴谋。（子廉为洪门一头儿，辛亥革命时，曾偷取杭州旗营所有炮门，致满兵无法开炮，亦沪杭闹人之一。）就请来问道：‘子廉哥！听说依要同张汉卿过不去，阿中格桩事体呀？’子廉虎的站起来道：‘大家都要同伊过不去。何止阿拉！伊把东三省送掉啦，热河又完了。就想一走了事吗？’我说：‘请坐，请坐。慢慢交讲。’随又说道：‘东三省格桩事体咧，是伊的大错。但是伊丢脱勒，仍旧要伊拿回来呀。伊还年轻，又有志气，想到上海来戒烟后再出国，但若到了吾俚格地头，有格三长两短，伊连戴罪立功的机会也都没有了，那时人家不怪，反怪吾俚上海人把东三省永远断送，连拿回来的希望也没有了，真是何苦呢！’子廉气鼓鼓的不响，等了一阵，气慢慢平下来。伊说：‘杜先生！依那哼讲，阿拉就那哼做。我回去劝告大家，不要对付伊罢。’”

杜向我们续道：“一场祸水，方才平息，倒也吓啥。令阿拉为难的，倒是戒烟。只好把伊五花大绑，捆在床上，伊大喊大叫了四五天，才松绑。交关好笑。”——从这段谈话，即可知国人对汉卿印象之一斑。

可见张学良这场黑锅可真背得身败为裂！

张学良有充分证据

张学良自从替国民党党中央背了黑锅后，国民党一直不放过他，一直把这种糗史总归户到他头上。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失掉自由。自浙江溪口移到安徽黄山，再移到江西萍乡，再移到湖南郴州、沅陵，再移到贵州修文，再移台湾新竹，一直被严密地监禁着，严密得二二八事变的时候，他虽在台

湾,可是“三天以后才知道”!

在这样一连几十年的监禁中,张学良除了对看他的人说一说。已经毫无其他自白的机会。对西安事变,他是绝口不谈的,全对“不抵抗”的黑锅,他却有这样的反应:据余子《张学良与我的一段因缘》中追记:

当在山道漫步时,我忽然问道:“副司令!当年鬼炮轰北大营时,假定咱们的部队硬同它干,一面从关内急调大军赴援,您看是不是顶得住?”他面容忽变惨淡,默默地走了一阵,对我说道:“这事我有充分证据,证明俺没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领袖的地方。只是现在还不便公开。”余亦自不便自提。

把这段话同石九龄的透露对照起来,就知道张学良的确不是“不抵抗”的祸首,他有证据,但是无法公开,他做了替罪羊,被蒋介石给要了!

何世礼说话了

就这样的,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四十年过去了,但是国民党还不放过他。在张学良八十岁的时候,国民党的电视《大时代的故事》联播里,居然还搞起九一八那天张学良的行踪问题。《大时代的故事》由台视节目部经理李圣文主播,由陈在俊编撰,实际上是国民党党史会秦邦仪支援的。他们在一九八〇年六月二日的节目上,又拿这个问题来臭张学良。这一无知的举动,终于使何世礼将军看不过去了。何世礼是九一八事变时的东北少校参谋,他是广东宝安县人,在英国法国学炮兵,被东北军人看中,请到东北去,他当时宁愿不做高级军官,而从低级干官干起,以获取较多经验。后来他升到国防部次长、驻日代表团团长、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以陆军二级上将退役。现任国策顾问、香港工商日报董事长。他看了《大时代的故事》后,在一九八〇年十月号的《中外杂志》第二十八卷第四期里,写了一篇《为历史作见证:“九一八”之夜张学良身在何处?》全文说: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初,本人服务于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参谋处,充少校参谋,嗣奉调沈阳北大营,任第旅长六二〇团第二营营长(本人前曾在该大营该旅王铁汉先生之三十七团,亲自番号为一九团,任平射炮连连长),正拟遣往沈阳到差之际,适先父晓生公,亦应张副总司令汉卿(学良)先生之邀赴平,洽商东北边业银行改组事宜,盖其时张先生系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身份,驻节北平,仍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主理东北军政事宜,故先父偕先母张太夫人由港赴平。只以不谙国语,张副总司令遂命余与内子留平数天,担任临时传译,以便讨论改组银行事宜。

迨九月十八日,在平之东北军政要,为筹募辽北大水灾救灾基金,当晚举行平剧盛大义演,地点在开明大戏院,所有在平著名伶工,如梅兰芳等等,莫不参加演出,极一时之盛,各国驻平使节,及当时绅商名流,亦踊跃观赏,座无虚席,因先父有所捐助遂亦偕同先母与本人夫妇,应邀趋陪末座,当演戏至精彩阶段时,忽见张副总司令报告,谓沈阳有长途电话,请其亲往接听,张先生尚轻松地囑该员代为接听,诨不旋踵,该员迅速返报,谓沈阳出事,务请张副总司令亲自接听,张先生始行离席,此后即未见张先生再行返座,先父母当时亦甚诧异。

异,不意翌日北平各报之头条新闻,均报导日寇已于“九一八”一夜之间。攻占了沈阳等地,震惊了全世界,也预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火种,事隔虽已半世纪,但由于印象深刻,所以至今尚历历如在目前。

本年六月初,本人适在台北、于六月二日晚间看联播节目时,听广播员报告:谓当晚张副总司令汉卿先生究在何处,尚无法查明云云,又看到老长官王铁汉先生讲述当晚情形,爰特说明事实如上,以为历史见证。

这篇文章,算是九一八之夜真相的第一次正式澄清。何世礼这篇文章中,有三点可以补充的:第一、那天演的戏是《宇宙锋》;第二、那天晚餐张学良是与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吃的,吃完了还举行一次时事会商;第三、张学良那时刚刚重病(恶性伤寒)后下床,他还在抱病之中,更不可能“更抱佳人舞几回”了!

张学良是爱国者

就这样的,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行踪的真相,才在五十年后,正式大白于世;国民党五十年来对张学良的造谣诬蔑,对为他们背黑锅的爱国者的迫害,也正式大白于世。

多少年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国民党的宣传下,好像是坏蛋似的、不爱国的人似的,这是绝对与事实不符的。相反的,“张家父子在东北的治绩与对国家之贡献,远超过同时代之各省主政者。”以西安事变为例,即使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里也承认,张学良他们“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足以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张学良的为人与评价,在沉冤五十年后,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了,我们不容国民党关人五十年又臭人半世纪了!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日晨作;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稍加订正。

蒋介石怎样谋杀杨虎城 ——“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双十二)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使蒋中正有了半个多月的失掉自由,影响所及,至为深远。发动事变的,是两位上将——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关于张学良部分,他自三十八岁给关到八十三岁、八十四岁、八十五岁,如今垂垂老矣,我已有《别赖张学良了!》专文为他抱不平,收在“千秋评论”第十五期《旧案·新党·兔》里,关于杨虎城部分,他在大陆撤退前被国民党给秘密灭门、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儿女、从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到副官阎继明、到警卫员张醒民,都被乱刀扎死,关于杨虎城的“前事”,我们不可忘记,以为“后事之师”,下面就是我的“不忘”的报告。

杨虎城的身世

杨虎城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生在陕西省薄城县孙镇甘北村的一个穷苦农家里，他的父亲杨怀福是农民，也兼做木工。四十四岁那年（一九〇八年），因受分家陷害，被黑暗政府绞死在西安。这时杨虎城只有十五岁，上有寡母，下有幼弟，不但要养家，并且还要替父亲还生前欠的债，处境艰苦异常。他本在十岁起念书，十三岁辍学，在镇上小饭店当童工，父亲死后，更苦不堪言，为了埋葬父亲，他加入“孝义会”，“孝义会”是谁家死了人家都帮谁的一个互助会，是农民的合作组织，这个组织慢慢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中秋会”，到了辛亥革命前，它已发展为几百人的组织。因为规模变大了，它就变得有抗富济贫，除强扶弱的性质。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在武昌起义后，陕西也爆发了革命，杨虎城率领“中秋会”的同志，参加了奉行秦陇复汉军，与清军作战，革命成功后，他退伍还乡。这时蒲薄城东南乡有一个土豪劣绅，叫李桢，此人出入官署、包揽词讼、强占民女、设赌赌头、无恶不作，同时还兼任地主的“讨债公司”负责人，到处欺压百姓。杨虎城这时二十一岁，血气方刚，实在看不过去，就把李桢给干掉了。干掉李桢后，杨虎城亡命在外，参加一九一五年的讨伐袁世凯活动。一九一六年，陕西省整编军队，担任营长。一九一八年，升任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一九二一年阎相文奉吴佩孚命到陕西收编靖国军，别的人都同意收编了，可是杨虎城忠肝义胆。不为所动，率领五千人，与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同进退，向陕北转进。沿途一千几百里，备极艰辛。他后来回忆：

当时走在前边的部队，有时还可以找一些山芋之类烧着吃，官兵的嘴都变成黑的。我到了宿营地。大家正吃烧山芋，却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礼让，只有一个老炊事员向我作了礼貌性的表示，但结果他手中那半截山芋还是塞进他口里去了。

虽然杨虎城饱受困苦，但为了革命，为了支持孙文，他一切都甘心愿意。一九二二年，他派姚丹峰到上海，与孙文取得联系。

一九二八年，他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文要姚丹峰参加。一九二五年三月，孙文死了，杨虎城是陕西省唯一表示哀悼的。这时他三十二岁。

一九二八年，吴佩孚派刘镇华围西安，杨虎城时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赶到西安去支援。从四月十六日起，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孤城死守，前后八个月，吴佩孚悬赏十万元买他的脑袋，城中饿死军民近五万人，但是他苦战不屈，拖住了十万之众的敌人部队，为国民党北伐的成功，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①

一九二七年，杨虎城出任西北军国民联军第十路（后改为第十军）总司令，参加北伐。一九二八年四月前往日本，十一月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二十一师师长。一九二九年，任新编十四师师长。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原大战开始；四月任讨逆军第三军团中央军司令官；七月任讨逆军左翼军总指挥